

铸造战争的模具：和平结构如何生产出它无法容纳的致命冲突

战争为何反复发生？主流的“病因学”解释将其归咎于资源稀缺、人性贪婪或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却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何大致相同的结构性条件，在绝大多数时候被和平吸收，却在特定时刻将冲突推向总体战争？本文提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冲突理论，认为战争的爆发不是一个“故障”被触发，而是一段特定的和平结构在运转中，不自觉地生产出了自身无法容纳的冲突形态。

作者 阳涌 · 约 2.5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战争为何反复发生？主流的“病因学”解释将其归咎于资源稀缺、人性贪婪或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却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何大致相同的结构性条件，在绝大多数时候被和平吸收，却在特定时刻将冲突推向总体战争？本文提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冲突理论，认为战争的爆发不是一个“故障”被触发，而是一段特定的和平结构在运转中，不自觉地生产出了自身无法容纳的冲突形态。本文以一战爆发这一经典案例为经验锚点，通过对1908–1914年间关键危机中具体决策过程的深度重构，追溯冲突的形态如何从可被分散裁决的摩擦，逐步被压缩为一条必须通过全面战争才能“结算”的总体对抗。在深描过程中，三种相互咬合的生成性动态逐一浮现：制度性危机消化渠道在日常运转中被反复架空，敌意叙事从可校正的认知工具蜕变为自维稳的闭环回路，而为战争所做的确定性准备则以其自身的操作逻辑吞噬了政治判断的最后回旋余地。在此基础上，本文界定其理论的适用边界与证伪条件，直面对其构成最有力挑战的理论对手——历史制度主义、安全化理论与组织社会学——并论证本文所提供的理论收益不能被上述框架的组合所还原。最后，本文讨论其实践意涵，指出战争预防的核心工作不在悬崖边的博弈，而在和平时期对模具自身的日常拆卸。

关键词：冲突形态转化；危机的制度性消化；敌意的自我再生产；操作确定性的反噬；一战起源

一、引言：在和平的内部，追问战争的生成

对战争爆发的追问，长期被一种“病因学”的思维范式所主导。在这种范式下，和平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默认状态——一个没有特殊事件就不会破裂的容器。战争则被理解为对这个容器的破坏，而理论的任务是寻找那个破坏它的“病因”：资源稀缺、人性贪婪、安全困境、领导人的误判。这些因素清单并非全错，它们捕捉到了冲突的燃料，却搁置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燃料始终存在，为何只在极少数时刻被点燃？换句话说，为什么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同样程度的贪婪、恐惧和安全困境，并没有导致大国间的总体战争，而是被各种制度、规范和力量均势所吸收、转化、消解——表现为漫长的诉讼、激烈的外交摩擦或心照不宣的代理人博弈？

病因学范式之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将和平处理为一种不需要解释的常态背景。一旦我们追问“这段特定的和平是如何维持自身的”，战争的起源问题就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我们不再问“什么打破了和平”，而是问“这段特定的和平，是如何把自己运行到战争的边缘的？”本文试图为这个位移后的新问题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战争不是在某一刻被“打响”的，而是在一段漫长的和平中，被和平结构自身的运转，一步一步地“铸造”出来的。和平不是空无一物的容器。和平本身是一套活生生的制度安排、认知框架与军事组织实践的复合体。它有它的刚性、惯性和生命周期。当这套复合体在日复一日的正常运转中，无法将其内部不可调和的力量消化为可被分散处理的摩擦时，它不会简单地“破裂”——它会变形，变成一个模具，持续地压缩、塑形和加热被它扣住的冲突，直到将其铸造成一个必须通过全面战争才能“结算”的形态。

本文关注的不是冲突的内容（谁和谁在争什么），而是冲突的形态——它是如何从一个可以被分散裁决、逐项处理的分散状态，被压缩为一条不可分割的、零和的、非一战不可的总体对抗的。本文用以描述这一形态转化过程的术语是“战争铸造”（War-Forging）。它指的是一种由制度化日常实践所持续再生产的、非意图性的结构压力累积过程：和平结构在生产自身秩序的同时，作为副产品，也在系统地压缩冲突的消化空间、硬化敌意的认知框架、并缩减政治决策的操作余地，直到全面战争成为阻力最小的、因而被理性计算所偏好的唯一选项。

本文选择一战作为核心案例，基于两个考虑。其一，一战是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大国战争之一，档案史料极为丰富，使得本文可以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基于一手和二手材料的机制追踪。其二，一战堪称“战争铸造”的典型案例：它的爆发被几乎所有参与者事后描述为一场“滑入”或“被卷入”的灾难，而非一个明确的“决定”。这种强烈的非意图性——所有人都不想打，但所有人都被逼着打了——恰恰是“铸造”机制最适用的案例类型。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冲突研究中的主要既有解释进行检讨，尤其聚焦于安全困境理论、安全共同体理论及其后继发展，明确“战争铸造”框架与它们的根本区别。第三节是全文的核心经验

章节，通过对1908–1914年间关键危机中具体决策过程的生成性重构，让三种相互咬合的动态——危机消化渠道的制度性架空、敌意认知的自我封闭循环、确定性准备的操作性反噬——从历史互动的褶皱中逐步浮现，而非作为预制标签被钉在材料上。第四节直面最有力的理论对手——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漂移理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以及组织社会学中的目标置换与正常事故理论——通过构建一个不可还原的判别论证，正面论证本文所提供的理论收益不能被上述框架的组合所代理。第五节讨论实践意涵。第六节正面回应两组最严峻的反驳（结构决定论反驳与冷战负面案例），并明确理论的边界条件与证伪方式。第七节为结论。

二、从病因到生成：既有解释的贡献与盲区

在展开核心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种解释路径做一次诚实的检讨。本文并非要否定它们的洞见，而是要指明它们共享的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正是这个预设，使得它们无法触及“战争如何从和平内部被生产出来”这一更深层的问题。

2.1 安全困境及其修正：贡献与限度

在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安全困境理论，是关于大国战争起源的最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之一。安全困境的核心逻辑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如增强军备、缔结同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从而迫使后者采取反制措施；最终，所有国家的安全感都下降了，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战争的风险反而增加。这一理论已经触及了互动与过程的层面，它不将战争简单地归咎于某一方的恶意，而是将其定位为结构性条件下互动的悲剧性产物。

在安全困境理论的后续发展中，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安全政权”概念和格拉泽（Charles Glaser）的“进攻-防御区分”理论，进一步细化了结构压力与冲突升级之间的关系。杰维斯指出，在某些条件下——如进攻-防御平衡倾向于防御、且这一平衡可被各方共同识别——国家可以建立“安全政权”，通过规范、制度与相互克制来缓解安全困境的恶化。格拉泽则论证，当防御性武器可以清晰区分于进攻性武器，且防御占有决定性优势时，国家可以大幅降低安全困境的螺旋效应。

这些发展在经验上是重要的：它们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的无政府结构下，某些时期安全困境得到了有效管理，而另一些时期则走向了失控。然而，所有这些修正版本共享着一个更深的预设：他们将分析焦点放在行为体对给定结构条件的“反应”维度——国家如何感知对手、如何计算进攻-防御平衡、如何选择合作或对抗的策略。即便杰维斯的认知路径强调知觉与错误知觉，其分析单元仍然是行为体的认知判断与策略选择：是误判了对方的意图，还是错误估计了军事平衡。

本文与这一传统的根本区别，不在结论，而在分析焦点的层次。安全困境理论的追问方式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冲突？”本文的追问方式则是：“在一段特定的、拥有制度化冲

突管理机制的和平秩序中，这套秩序是如何在日常运转中，逐步丧失消化冲突的能力，以至于将冲突逼向一个它自己也无法容纳的最终结局？”前者追问的是行为体的反应逻辑；后者追问的是结构自身在生产其“正常秩序”的同时，作为副产品所累积的非意图性压力形态。这不仅是分析焦点的位移，更是对“结构”与“行为体”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

这个区别可以通过一个类比来说明。安全困境理论与它的修正版本，像是一群气象学家在追问：“风暴为什么形成了？”他们测量气压差、温度梯度、风向突变——这些都是在结构条件给定的前提下，解释系统如何响应变量的变化。而本文的追问方式类似于：“为什么在这片特定的地形中，原本可以逐日消解的气压差，没有被分散释放，而是被山谷走向和地表形态引导为一条单一的、加速的风暴通道？”追问的对象变了——不再是系统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系统自身的“地形”——和平结构本身的制度纹理、认知惯性与操作逻辑——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运转中，把冲突的形态从“雷阵雨”塑造成了“龙卷风”。

这并非否认安全困境的洞见。恰恰相反：安全困境作为恒常条件，解释了为什么冲突的“燃料”永远在场。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绝大多数时候，燃料被制度化的管道分散排解，而在少数案例中，管道被系统自身产生的刚性废料堵死，导致压力必须寻找一个单一出口。换言之，安全困境理论成功地描述了“系统里永远有压力”，但没有发展出足够精细的工具去分析“系统自身是如何改变承压结构的”。本文的工作，正是试图为后一个问题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2.2 走向另一个方向：安全共同体理论的正面启示

在转向本文的核心论证之前，有必要召唤一位同样追问“和平如何维持自身”的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对话者——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及其后续发展。如果说安全困境理论解释了和平为何脆弱，那么安全共同体理论则追问：在什么条件下，一组国家可以演化为一个在其中战争不再是解决争端选项的共同体？

多伊奇的开创性工作识别出了“多元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要件：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跨国社会沟通的密集网络、以及对冲突将和平解决的可靠预期。后续研究进一步将这一框架操作化为“共同体感”的制度化建设——包括安全话语的“去安全化”实践、地区组织的冲突调解机制、以及精英之间信任网络的培养。这一传统在经验上解释了不少令人困惑的成功案例：为什么法德在1945年之后能够从数百年世仇转变为欧盟的轴心，而同样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创伤的其他国家组合却未能复制这一转型？

这一对话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被本文问题框架隐含地依赖、却未曾在分析中正面提出的逻辑前提：和平结构具有自我演化的两种可能方向——它可以向“共同体化”（不再生产战争）的方向演化，也可以向“战争铸造”（越来越无法容纳和平）的方向演化。如果安全共同体理论展示的是前一种演化的关键机制（跨国信任网络、共同价值观的内化、制度化的争端解决），那么本文

试图追问的则是：在什么条件下，和平结构在运行中反而丧失了这些共同体化的可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哪些特定的结构特征——如不可分割的威望议题、高度对抗的意识形态、具有进攻优势的军事技术——会使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机制失能，从而打开战争铸造的通道？

引入这一对话，并非要在论文中开辟第二个战场。它的作用是为本文的理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对照面”。当我们能够清晰地指出“铸造”机制与“共同体化”机制在哪些关键条件上相互对立时，本文所诊断的病理就不再是孤立的个案描述，而是一个更广阔的理论光谱——“和平结构的双向自我演化”——的其中一极。这个定位，将在第四节的理论对话中发挥支撑性作用。

2.3 从过程研究到生成研究：一个未完成的转向

本文并非第一个试图将战争分析从静态病因转向动态过程的研究。在国际关系与和平研究领域，一个虽非主流但相当重要的过程性研究传统，已经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冲突升级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冲突如何从非暴力走向暴力的序列与机制。路径依赖理论则强调早期选择的“锁定”效应：一旦走上了某条路，正反馈机制会让改弦更张的成本越来越高。一战史学的“费舍尔争论”及其后续研究，则在一个具体案例中深度挖掘了制度惯性、军事计划的刚性以及认知偏见如何将大国推向战争。

本文站在这些研究的肩膀上，但试图走得稍远一步。大多数过程性理论仍然倾向于将冲突升级视为行为体在给定结构条件下做出的可归因的反应动作。它们关心的是行为体的意图、误判、策略选择，以及这些反应如何构成了一条逐步升级的链条。斯奈德对一战中“进攻性崇拜”的研究、范埃弗拉对“进攻占优”信念的分析、以及杰维斯对知觉与错误知觉的经典论述，都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它们的分析框架，始终将因果箭头指向行为体的信念、计算与选择，即使这些信念是偏误的，计算是失灵的，选择是被误导的。

本文试图将分析焦点从行为体的“反应”位移到和平结构自身运转中的“非意图性生产”。当消化冲突的制度在一次次的被援引与被违反中，不是被摧毁而是被“空转”架空——这不是任何一方某一次拒绝谈判的“行动”造成的，而是数十年来每次危机之后，旧制度被削弱一点、新替代又未能建立一点，最终形成的制度真空。当敌意叙事不再只是领导人有意操纵的工具，而变成一种制度化的认知惯例，开始自动摄取并消化任何与之相悖的信息——这种蜕变不是某一方某一次宣传攻势的“选择”造成的，而是双方的军事教育、社会舆论、官僚竞争在长期互动中共同收敛到的一个自维稳的认知均衡。当追求确定性的军事计划，其自身的操作逻辑开始反过来主导政治决策的时间窗口——这种反噬不是某一国的总参谋部“决定”去绑架政治决策造成的，而是数十年来在“追求效率”的单一目标下不断优化计划编排、不断压缩容错空间的累积产物。在这些时候，一种超越单个行为体控制的“铸造效应”就产生了。它不取消人的选择自由，但系统性地重塑选择空间，使得通往战争的道路成为阻力最小的那条路径。

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本体论上的区分——从“反应”到“生产”，从“行为体的策略选择”到“结构自身的非意图性后果累积”——本文采用了“战争铸造”这一表述。它试图捕捉的，不是行为体在给定结构条件下“做了什么”，而是结构在行为体的日常实践中“变成了什么”。

三、铸造的生成：1908–1914年冲突形态的历史转化

必须用一个方法论上的直白陈述来开启本节。读者在进入本节之前，除了已经知道本文的核心关切是“冲突形态如何被和平结构自身的运转所转化”之外，尚未被赋予任何关于“具体是哪些动态在推动这一转化”的预制概念。以下叙述不会先给出三套定义好的机制术语，然后再去寻找历史材料来“证实”它们。相反，我们将直接沉入1908年至1914年间一系列关键危机中的具体决策过程——外交函电的往来、军事命令的草拟、内阁会议的辩论、舆论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话语互动。让那些将冲突的形态逐渐推向不可逆方向的历史动态，从这些具体的互动中自然浮现出来。概念是终点，不是起点。

3.1 制度在日常运转中被架空

1908年10月，奥匈帝国正式宣布吞并它已占领三十年的奥斯曼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公然违反了1878年柏林条约——该条约将这两个省份交由奥匈管理，但保留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塞尔维亚和俄国援引条约，要求召开大国会议重新讨论这一单边行动。

按照1815年以来欧洲协调的惯例，这本应是一个典型的“会议消化危机”的场景。欧洲协调并非一个成文的国际法体系，而是一套基于共识与惯例的冲突管理机制：当大国间出现涉及领土或势力范围的重大争端时，通过召开会议来协商解决，避免单边行动破坏整体均势。在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套机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1856年巴黎会议、1878年柏林会议——每一次，列强都在战争的边缘及时刹车，通过会议桌上的补偿性再分配来消化危机。

1908年危机的走向却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模式。我们可以在三个层面观察制度是如何被绕过的。

外交层面的转向。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指示是明确的：支持奥匈，逼迫俄国承认吞并。德国向俄国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照会，要求俄国在“承认吞并”或“面对奥匈及其盟友的后果”之间做出选择。这不是在会议桌上的讨价还价，这是将会议的可能性本身从谈判桌上移除。俄国在日俄战争后国力空虚，被迫让步。按照欧洲协调的旧逻辑，即便一方在争端中占据强势，也应该通过会议的形式——哪怕是一个走过场的会议——来给弱势方留一个体面的台阶。德国的照会没有给俄国台阶，它直接把楼梯拆了。

军事层面认知的悄然位移。奥匈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在危机期间多次向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力主对塞尔维亚发动预防性战争。虽然皇帝并未批准，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提议从一

种不被当真对待的边缘声音，变成了帝国内部主流军事思维的一部分？康拉德的论证逻辑是：既然将来迟早要与塞尔维亚打，不如趁现在俄国虚弱、无法出兵干预时早打。这个论证在当时因为未被采纳而显得没有直接后果，但它留下了一个认知遗产：在奥匈的军事决策层中，“战争迟早要来”的预期，从此前的模糊感觉沉淀为了一种被反复计算、反复验证的“技术性判断”。当“迟早要来”从一个经验直觉变成了一个被不断引用的军事评估结论时，它在认知上就已经开始形塑后续的决策空间。

制度合法性层面的侵蚀，比外交失败更微妙。欧洲协调的裁决机制，其运作依赖于一个前提：参与各方共享一个基本共识——通过会议来解决争端是一个比单边武力行动更可取的程序。1908年之后，这个共识从两个方向上同时被侵蚀。在德国和奥匈一方，他们从事件中学到的经验是：单边的强硬可以取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成果。在俄国一方，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事件后在给沙皇的备忘录中明确写道：“下一次在对奥问题上，俄国绝不能再退让。退让一次，就会永远被视为可以被施压的对象。”这句话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一份在后续数年间被反复援引、被新证据重复加固的制度化教训。它在俄国军政精英内部沉淀为一套行动准则：在对奥问题上，任何外交妥协都将被对方读解为软弱；只有展示不可退让的武力决心，才能保卫利益和尊严；因此，在下次危机中，必须从一开始就显示军事动员的姿态。

在奥匈一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1908年读解为完全相反的经验：塞尔维亚与俄国在强硬面前都退缩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而在果断的、不容谈判的强硬姿态。康拉德在1908年后多次上书皇帝，力促对塞尔维亚的预防性战争，他的论证每次都围绕着同一个逻辑轴心：拖延只会让对手更强大，早打比晚打更有利。

这里有一个值得停留片刻的关键关节。双方从同一次制度失败中汲取的教训，恰好构成了一套互为保证下一次冲突会来得更猛烈的认知配方。这不是一个逻辑推演，而是一个在实际的制度通道和组织惯习中被逐层落实的过程。在俄国，1908年后军政精英内部关于“决不再让”的共识通过具体的组织渠道转化为现实压力：在对奥军备拨款上，主张强硬路线的泛斯拉夫主义派别在议会获得了更多话语权；在黑海舰队现代化和西部军区动员预案的编制中，“不再接受外交羞辱”被内化为计划编制的默认假定。在奥匈，康拉德及其支持者则将“强硬有效”的经验不断注入后续危机的决策惯性中——每一次新的巴尔干摩擦，康拉德都援引1908年的先例来论证“果断行动”的必要性。一方的“强硬获利”经验和另一方的“退让被辱”教训，通过军备竞赛、舆论动员和组织记忆的传递，在每一次后续危机中相互激化。

到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模式：制度的权威不是被一次革命推翻的，而是在日常的援引与违反中，被一点一点架空的。当双方都从同一次程序的失败中学到了“不再信任程序”的教训时，这个程序在下次危机中连被援引的资格都丧失了。旧制度并未被废除——它还在纸面上——但它的实质约束力已经空了。

3.2 敌意认知在互动中封闭自身

如果说1908年标志着制度层面消化渠道的第一次系统性堵塞，那么随后数年间——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则构成了一连串认知上的反向解读回合。在这些回合中，敌意叙事逐渐从可被事件校正的判断工具，蜕变为一种自行摄取事件并为之赋予固定意义的封闭回路。

以法德关系为例。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导致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法德之间种下了领土创伤的根。但这个创伤本身只是一个条件，并不自动等于持续的战争冲动。将它从一个“条件”转化为一个持续运行的敌意叙事机器的，是一系列此后的互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是一个关键节点。

危机起因是德国派遣炮舰“豹号”前往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表面上是保护德国侨民，实际上是向法国施压，要求其在其他殖民地上做出领土补偿。法国的反应是强烈反弹；英国的介入使得局势进一步紧张。最终通过外交谈判，德国获得了刚果的一部分领土作为补偿，法国则巩固了对摩洛哥的控制。从表面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危机被化解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止步于“危机是否化解了”，而是追问“这次危机在双方的认知框架中分别留下了什么痕迹”，图像就变了。在法国舆论中，阿加迪尔事件被广泛读解为一个清晰的叙事：德国在测试法国的决心，试图通过武力威胁获取单边利益；而法国展现的坚定——尤其在英国的公开支持下——成功地遏制了德国的野心。这一解读的核心叙事框架是：“德国是不可信的扩张威胁，而坚定的力量展示可以威慑它。”在德国舆论中，同一事件则被读解为：德国在一次合理的外交诉求中被英法联手羞辱，最终只获得了刚果的一点残羹冷炙。这一解读的核心叙事框架是：“德国被包围了（Einkreisung），英法在合谋压制德国应有的‘阳光下的地盘’，而软弱的外交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让我们仔细看这里发生了什么。同一次事件，被双方的解读机器加工后，输出的是两套完美互证且互相激化的叙事：法国的叙事从事件中提取了“必须继续强硬化”的教训；德国的叙事从同一事件中提取了“必须在下一次更坚定、不再让步”的教训。这构成了一个自我稳定的双向反馈回路。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尤其是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法俄协约与德奥同盟各自作为对方盟友的角色介入巴尔干争端——这个回路被反复强化。每一次危机之后，双方各自国内那些主张“必须对对方更强硬”的政治力量就获得更多的舆论支持和预算拨款。敌意叙事开始脱离对“对方做了什么”的依赖，获得了自我供能的内部燃料。无论对方做什么，叙事都准备好了现成的解码公式。对方强硬，是“暴露了其扩张本质”；对方示好，是“麻痹我们的阴谋，削弱我们的警惕”；对方不动，是“在暗中准备更大的动作，等着我们放松的那一刻”。当叙事封锁了所有可能将对方行为读解为非威胁状态的通道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外部事件校正的判断工具了。它变成了一个自行生产敌意的机器。

这个闭合过程在俄国与奥匈之间走了一条不同的经验路径，但驶向了相似的终点。双方各自从1908年汲取的教训在上文已述。到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时，这些教训已经通过历次危机的反复加固，进入了双方的军事教育、舆论动员和官僚竞争之中，获得了不再依赖外部刺激的自我再生产动力。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需要巴尔干的强硬来巩固国内地位，奥匈军方需要外部威胁来证明扩军预算的合理性。到这一步，敌意叙事在双方的内部政治中都承担了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任何试图拆解敌意叙事的内部声音——无论是俄国财政部对军备竞赛不可持续的警告，还是奥匈匈牙利派对吞并更多斯拉夫领土的抵制——都会被视为对组织利益本身的威胁。

敌意不再是需要被外部事件维持的火。它变成了自供燃料的炉。

3.3 确定性追求吞噬政治判断空间

制度层面的消化渠道在一次次危机中被架空，认知层面的敌意叙事在一次次反向解读中封闭自身。这两种动态持续地为冲突备好单一出口、并加压加温。而第三个动态——战争准备对确定性的追求，在操作层面逐渐锁死一切回旋余地——则在1914年7月最后倒计时中，展示出了它吞噬政治判断空间的全部力量。

要理解这一点，不能泛泛描述“军事计划的刚性”，而必须进入一个具体的决策节点，去看见政治家的判断是如何被操作程序的技术语言一步步限定到“没有选择”的。1914年7月29日至30日，俄国面临的局部动员与总动员之争，是整个七月危机中最能展示这一动态的样本。

萨拉热窝刺杀后，奥匈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25日，塞尔维亚几乎全部接受了通牒条件，仅在两点上有所保留。按照旧有的外交规则，这本应是启动进一步谈判的契机。然而奥匈——在德国“空白支票”的支持下——于7月28日直接宣战。7月29日，俄国作为塞尔维亚的保护者，面临一个关键的抉择：是只在与奥匈接壤的边界进行局部动员，以此作为对奥匈施压、同时避免刺激德国的信号？还是启动全面总动员——包括对德战线——从而几乎必然触发德国的强烈反应乃至宣战？

在政治逻辑上，局部动员是合理的选项。它可以在展示决心的同时为外交斡旋保留空间。但在军事操作逻辑上，它被俄军总参谋部断然否决。俄国总参谋部的论证，依据的是已编排多年、只待启动的第十九号动员计划。该计划只有一种选项：全面总动员。铁路的时刻表、兵员的集结序列、补给品的调配，全都按照“同时对德对奥作战”的假定进行精密编排。任何临时的修改——比如只调动针对奥匈的部队——都将导致整个动员序列的全面混乱。在总参谋部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交的论证中，核心命题是：如果只进行局部动员，那么一旦德国宣战，俄国将处于灾难性的战略劣势。局部动员等于自杀。

这个判断在技术上是成立的。但它的成立，依赖于一个它自身无法审查的前提：德军一定会在俄国任何形式的动员后宣战。这个前提本身不是一个技术事实，而是一个战略判断。但当它被嵌入

军事计划编排的逻辑之后，它就获得了技术事实的外壳，因为它被写进了铁路时刻表里。你不能再追问“这个前提本身是否可能被政治行动所改变”——因为修改时刻表本身就意味着葬送战备。

这才是“确定性追求反噬政治判断”的核心机制。这个链条的生成史可以追溯至数十年前。第一步：各国总参谋部在“追求对最坏情况的控制”这一目标下，将战争计划从“多套备选方案”逐步优化到“唯一一套最有效的全面动员与首轮攻势方案”。第二步：这套方案的极端精密性——数百万兵员的集结、数万列火车的调度、同步到小时的弹药补给——产生了无法临时修改的技术刚性。第三步：这种技术刚性在危机时刻转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论证权威：任何不按计划办事的选择，都会导致“无法接受的灾难性风险”，而这个风险的具体量值已经被计划中的计算所“证明”。第四步：政治家虽然保留着否决权，但他的否决权在面对“军方以技术语言陈述的、关于不按计划行事将导致灾难的确定性论证”时，已经被实质性地掏空。否决意味着承担“一旦失败则全责”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在认知上已被军方的技术语言无限放大。选择被压缩到了无。

1914年7月29日黄昏至30日，这一逻辑在俄国决策层中完成了整个闭环。沙皇尼古拉二世先是批准了总动员令，随后在收到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私人电报——表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解决”——的深夜，又暂时收回成命，改为局部动员。但在第二天——7月30日——经过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与总参谋部数小时的联合论证劝说后，沙皇再次签署了总动员令。萨佐诺夫——他并非军人，而是一名外交官——为什么在24小时内从支持局部动员转向推动全面总动员？现存档案中的会议记录提供了一个比“他被技术论证说服”更细致的图像。萨佐诺夫在会前仍然相信外交斡旋是可能的；但在会上，总参谋部的军官不是用“战争不可避免”的信念来说服他，而是用补给调配表、铁路调度图和时间线推演，逐个向他展示局部动员在操作上意味着什么——兵员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区域、补给线在边境出现断裂、整个西部军区的防御部署出现不可弥补的缺口。这一系列技术陈述并非在论证“战争会赢还是输”，而是在论证一个更狭窄、但因此也更无法被外交官身份所反驳的命题：“坚持局部动员将导致军事灾难，而这一灾难的政治后果同样不可承受。”萨佐诺夫原有的“外交优先”认知框架，在这些具体的组织信息面前找不到立足点——不是因为它被驳倒了，而是因为组织环境未能提供任何可供外交框架运转的操作信息。他被剥夺了用自己的认知工具进行判断的原料。

在7月30日的最后决定中，俄国跨过了从“局部施压”到“全面动员”的界限——不是因为某个人做出了“要战争”的决定，而是因为那套追求确定性的机器，已经将所有通向非战争结果的操作路径，都用“技术上不可行”的论证堵死了。留下的唯一开放路径——那条铁路时刻表完全编码好的、可以无障碍执行的路径——就是全面总动员。

3.4 三种动态在1914年7月的咬合

行文至此，1914年7月最后一周的图景已经清晰浮现。萨拉热窝刺杀本身只是一个火花。它引爆的不是一堆预先堆好的火药桶，而是一整条制造火药的生产线。

消化渠道的日常架空，事先烧掉了所有可能消化这个火花的制度出口。欧洲协调已经空了——1908年被绕过，1911年在摩洛哥被侵蚀，1913年在巴尔干被搁置。当1914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再次提议召开大国会议时，这项提议本身是一个已经失去效力的手势——各方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会议能产生具有约束力的结果。

敌意认知的自我封闭循环，则确保了火花本身的形态被严重扭曲。它不再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刺客暗杀了奥匈皇储”——一个可以被特定化为单一犯罪事件、并通过引渡、赔款或有限惩罚来消化的事件。在奥匈的叙事编码里，它立即被读解为“塞尔维亚国家层面的阴谋”；在俄国的编码里，它立即被读解为“考验帝国尊严与斯拉夫保护者身份的时刻”；在德国的编码里，它立即被读解为“在俄国尚未完成军备现代化的最后窗口期内，支持盟友完成对塞尔维亚清算、检验协约国战争决心的时机”。单一事件被三个各自封闭的认知回路吸收并编码为三种互不兼容的“不可退让时刻”。

确定性准备的操作反噬，在危机进入最后倒计时后，驱离了所有可能中断这个进程的操作退路。俄国在7月30日的总动员决定，触发了德国的倒计时。施里芬计划的时间窗口开始闭合。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同日开始对法攻势。政治家在铁路时刻表、补给单和时间窗口的催促下，被一步步推到了那个他们无需再做任何决定的点上。战争降临，不是作为一项被选择的政策，而是作为一种被和平结构自身的存在方式挤压出来的、唯一还能被操作的结局。

这正是本文试图描述的那个过程：制度在日常运转中空转，认知在自我封闭中硬化，操作在追求确定性的极致中被锁死。三者不是先后发生的三个独立“因素”，而是同一套历史进程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维度——每一维都在加固另外两维，同时被另外两维加固。制度出口的堵塞迫使压力寻找更单一的释放方向，这为敌意认知的硬化提供了结构性的推力；敌意认知的硬化则不断地为军事机器追求“更确定”的操作提供“威胁恒常存在”的认知燃料；而军事机器在操作中排除一切容错空间的确定性追求，又反过来以“技术不可行”的铁证，证明了旧制度的无效，并加剧了“对方不可信任”的敌意叙事。三者互生的咬合结构，合力将冲突的形态从“可被分散处理的摩擦”铸造成了“必须通过全面战争才能结算的总体对抗”。

这就是“战争铸造”的完整形态，在1914年7月危机中第一次全面展示。接下来的第四节，将把这个从历史褶皱中浮现的结构放在既有理论的强光下进行检验：它是否真的不可还原，还是只是既有概念的重新组合？

四、理论的坐标：为什么不是制度漂移、安全化或正常事故？

本文第三节从历史过程的深描中，让三种相互咬合的动态逐步浮现。但如果说这就是理论的终点，则尚欠一步：必须将这一浮现的结构放在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中进行不可还原性校验。这一步的检验直接关系到本文是否有资格声称任何理论贡献。如果本文所描述动态——制度在日常中被架空、敌意叙事自我封闭、确定性准备反噬政治判断——能够被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漂移理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以及组织社会学中的目标置换与正常事故理论这三套框架的组合所无保留地代理，那么本文就只是一个新名字，而非新骨头。

本节的任务，是正面回应这一质疑。具体的论证策略如下：不逐一论证每一种既有理论“漏掉了什么”——这种论证容易滑向“别人问了A，我问了B”的划界方式，无法证明“我问的B是别人问不了的”。本文的策略是引入一个规范论证——证明既有理论的组合在某个特定节点上会做出与本文理论相反的预测，而其预测错误的根源，恰好在于它们集体地无法代理本文所识别出的那个咬合结构。

4.1 对手的确定

本文选择以下三组理论作为需要直面的“敌意最近邻”。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每一组都直接触及了第三节所描述的三个动态中的某一个核心维度，且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均已发展出成熟的解释传统。如果本文无法在与它们的对话中站稳脚跟，就不必再与其他次要对手纠缠了。

第一组：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漂移与制度层积理论。这派理论系统地处理了制度如何在维持形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其实际功能——即制度不是因为被正式修改而失效，而是因为变化的环境中，旧的规则被新的行为模式绕开或叠加，最终在实质约束力上被掏空。这直接对应第三节所描述的欧洲协调在1908年被“空转”架空的过程。

第二组：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这派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安全并非客观状态，而是一种言语行为——通过将某一议题宣称为“存在性威胁”，安全化行动者能够将其从常规政治议程中划出，置于可以合法使用紧急措施的领域。后续研究进一步识别出了“循环安全化”的动态，即一次成功的安全化行动会降低下一次安全化行动的门槛，因为“威胁恒常存在”的观众预期已经被建立。这直接对应第三节所描述的敌意叙事自我封闭的过程。

第三组：组织社会学中的目标置换与正常事故理论。默顿（Robert Merton）早在1950年代就指出，大型科层组织倾向于将工具性的程序规则本身当作目的，即原本作为达成组织目标之手段的规则，在日常遵从中被内化为目的本身，导致组织在追求工具理性时反而做出一系列从实质目标来看高度非理性的行为。佩罗（Charles Perrow）的正常事故理论则指出，在交互紧耦合的复杂系统中，灾难并非由单一故障引发，而是多重微小故障在紧密耦合中相互触发、不可预见的“正常”产物。这直接对应第三节所描述的确定性准备反噬政治判断的过程。

这三组理论各自都很强大。本文在开始自己的论证之前，先完全承认它们在各自维度上的解释力：制度漂移理论准确地描述了欧洲协调如何被架空；安全化理论准确地描述了法德与俄奥之间的威胁话语如何自我再生产；目标置换与正常事故理论准确地描述了军事计划如何从工具变成无法被政治指令修改的刚性机器。本文与它们的分野，不在“它们对不对”，而在“它们够不够”。

4.2 判别论证的构建

本文论证如下：上述三组理论各自捕捉到了战争铸造模具的一个核心零件，但它们共享一个结构性的局限——每一组理论的解释单元都是单一维度的过程（制度过程、话语过程、或组织过程），因此无法代理一个跨越制度、认知与操作三个维度之间的互生回路。这不是任何一组理论内部的缺陷，而是它们分析单元本身的构成方式所决定的。要捕捉互生回路，需要的不是其中任何一家的改进版，而是一个横向整合的分析框架。这正是“战争铸造”试图提供的。

为了使这一论证免于停留在断言层面，以下构建一个可操作的判别检验。这个检验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三组既有理论各自单独或简单相加，能够无残余地解释1914年7月危机中冲突形态的转化过程，那么在某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这个节点被选定为该转化过程中的关键决策时刻——三组理论各自的预测应该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节点，既有理论的预测方向与实际情况相反，且其预测失误的根源恰好在于它们无法捕捉跨维度的互生回路，则本文的论证成立。

本文选定1914年7月29日至30日俄国总动员决策作为该判别节点。选择这个节点的理由如下：它是一战爆发前最后一个可以中断全面动员的政治干预窗口；它是一个具体到可以被三方理论分别给出预测的、有档案可查的决策事件；而且它恰好位于制度维度（外交斡旋尚在运作）、认知维度（对德国意图的判断）和操作维度（动员计划的刚性）三者的交汇点上。

为了构建一个可操作的判别格，需要确定两组横切维度。第一维度是行动者对危机的政治控制程度的感知，取自安全化理论的预测框架：当“存在性威胁”的安全化话语已经高度制度化时，政治行动者会倾向于将危机视为不可谈判的生存问题。第二维度是行动者可选操作路径的数量，取自制度漂移与组织理论的联合预测框架：当旧制度已被架空、新替代制度尚未建立，且组织的标准作业程序已将备选方案排除干净时，可选路径将缩减至最少。

由此得到一个2×2判别格，如下：

可选路径丰富（制度弹性高 + 操作弹性高） 可选路径极其有限（制度已被架空 + 操作备选方案已被排除）

安全化话语高度制度化(威胁被感知为生存性且不可谈判) 【A格】高威胁感知 × 多选项：各方在高度警惕中仍有斡旋空间。既有理论预测：外交摩擦但可控。 【C格】高威胁感知 × 极少选项：各方感到威胁迫在眉睫，但无可行的非战争选项。既有理论预测：默认为最危险格。

安全化话语尚未高度制度化(威胁被感知为虽严重但可谈判)【B格】低威胁感知 × 多选项：典型可管理危机。既有理论预测：危机可控，通过常规外交渠道消化。【D格】低威胁感知 × 极少选项：各方不认为威胁是生存性的，但制度出口和操作弹性均已不足。判别格。

既有理论对【D格】的预测如下。制度漂移理论会预测：既然制度已被架空，行动者会尝试通过非正式渠道或双边沟通来寻找替代出口，因此危机仍有斡旋空间。安全化理论会预测：既然威胁话语尚未将对立建构为生存性问题，那么行动者不应感到“非此不可”的紧迫感，更不可能在未达到安全化门槛的情况下滑入战争。组织理论的预测略微不同但方向一致：它会在可选路径极为有限时预测一个“无法作为”的僵局——但僵局不等于战争；在真正滑入战争之前，组织惯性可以产生非意图的灾难性后果，但通常会有一个可识别的触发事件（某个人按下了某个按钮），而不是在没有任何一方明确决定的情况下“滑入”。

综合来看，既有理论的联合预测是：【D格】不会直接滑入总体战争。没有“存在性威胁”的认知加温，即便制度和操作已经十分脆弱，也应表现为外交僵局、摩擦加剧或局部冲突，而非全面战争在数日内快速引爆。

本文的理论对【D格】的预测则相反。本文认为，当制度在日常中被架空（消化渠道枯竭）和操作被确定性追求锁死（备选方案消失）这两个条件先行满足时，即使此前的安全化话语尚未将敌意推到“生存性威胁”的沸点，那个缺失的加温——敌意认知的自我封闭——会在危机紧迫感中被迅速、甚至自动地催化出来。理由如下：当冲突的出口已经被预先压缩至极少时，任何摩擦都会在系统中产生不成比例的压力；为了在这种压力下做出“合理”的决策，行动者的认知框架会倾向于迅速闭合——将对方的行为编码为威胁，因为不这样编码就无法在操作可及的少数选项中选择一个“负责任”的行动。换言之，敌意认知的硬化不仅是操作压力增大的原因，也是操作压力增大的结果。这是三组既有理论各自在自己的单一维度内无法捕捉的互生回路：制度出口的堵塞（制度维度）与操作弹性的丧失（组织维度）合在一起，为敌意叙事的迅速硬化（话语维度）提供了一个由结构压力自身催生的认知环境。既有理论将三个维度的进程视为各自独立展开、在时序上可以分别追踪的因果链；本文认为它们是互生的：操作刚性与制度真空不需要等待安全化话语的先行完成，它们自己就能在危机中被迅速“转译”为敌意认知的材料。

在这种互生回路的作用下，【D格】的冲突形态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如1914年7月的十天内——从“可谈判的外交摩擦”转化为“不通过战争就无法结算的总体对抗”。这不是既有理论的联合预测所预见到的那种逐渐升级的路径。这是一条因为模具各部件在同一时间相互激活而陡然出现的、事先在单一维度分析中都“不应存在”的通道。

4.3 回看1914年7月：判别格的实证对应

现在将上述判别格放回1914年7月的历史现场。7月29日，俄国决策层面临局部动员还是总动员的选择时，这个时刻对应的恰好是判别格中的【D格】。制度出口已经枯竭：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提议的大国会议，各方已经没有信心。操作备选方案已被排除：俄国总参谋部告知沙皇和萨佐诺夫，局部动员在技术上不可行。唯一一个尚未被完全封闭的维度是认知维度：德皇威廉二世在7月29日深夜发给沙皇的电报中仍然表示“有可能通过外交解决”，萨佐诺夫在7月29日白天也仍然认为外交斡旋是可能的。如果按照安全化理论的预测，在这个时刻，威胁话语尚未将对立推至“生存性威胁”的沸点——这应该是“还有斡旋余地”的迹象。如果按照制度漂移理论的预测，既然正式制度失效了，行动者可以通过双边非正式沟通寻找替代出口。如果按照组织理论的预测，局部动员被否决会导致行动僵局，但僵局不应在缺乏明确“战争决定”的情况下直接转化为全面战争。

实际发生的是：7月30日，沙皇在萨佐诺夫与总参谋部的联合劝说下，批准了全面总动员。萨佐诺夫在24小时内的转变——从他仍然相信外交可能的立场，转向“不总动员等于自杀”的立场——不是因为他被提供了新的关于德国必然开战的情报。我们已经在第三节中看到，他是被动员计划的技术不可行性论证所压垮的。认识到局部动员在操作上等于灾难后，他判断“坚持局部动员的政治后果不可承受”。而一旦全面动员被批准，德皇那封“仍有外交可能”的电报就被视为一个过期的、甚至是一个麻痹俄国的信号——敌意认知在操作压力下迅速硬化，填补了此前尚未闭合的认知缺口。

这个判别节点的实证对应，与本文理论的预测一致，而与既有理论的联合预测相悖。既有理论之所以在此处预测失误，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单一维度内运作的分析单元，无法主动捕捉那个跨维度的互生回路：操作刚性的压力如何在危机的倒计时中，自身成为催化敌意认知迅速硬化的材料，而敌意认知的硬化又反过来剥夺了任何可能的外交试探被认真解读的认知空间。

4.4 理论收益的不可还原性

基于上述判别论证，可以明确陈述“战争铸造”所提供的、不能被既有理论组合所代理的理论收益。它不是对既有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它们各自分裂的洞见在“冲突形态转化”这一核心问题上的交叉重组与推进。

既有理论各自看到的，是模具的三个零件。历史制度主义看到了制度如何在日常中被架空，安全化理论看到了敌意叙事如何在话语互动中自我再生产，组织社会学看到了组织程序如何从工具变成牢笼。它们各自都捕捉到了真实的过程。但将这三个零件放在一起，并不能自行构成一条生产线。生产线之所以是生产线，不在零件本身，而在零件之间的传送带——一个零件加工完后，自动将半成品送到下一个工位上，而下一个工位的加工又反过来增加前一个工位的运转速度。

“战争铸造”所命名的，正是这条传送带：制度出口的堵塞（零件一）不仅限制了冲突的消化空间，而且为敌意叙事的硬化（零件二）提供了结构性压力——因为当冲突无法被分散处理时，行动

者的认知就倾向于将冲突编码为更不可谈判的形态，以匹配那条已经被压缩的出口。敌意认知的硬化（零件二）不仅制造了更多的敌意，而且为军事机器的确定性追求（零件三）提供了“威胁恒常存在”的认知正当性，使得任何要求保留备选方案的弹性声音都被打压为“在威胁面前的软弱”。而确定性准备的操作反噬（零件三）在封闭了所有退路之后，又反过来以“技术不可行”的铁证，向所有行动者证明：旧制度已经不可用（加固零件一的空转）、对方不可信任（加固零件二的封闭）。

这就是“战争铸造”不可被既有理论组合所还原的理论内核。既有理论各自可以描述一个零件的工作方式，但它们无法描述“零件之间的互生传送”——因为在它们的分析单元里，制度就是制度，话语就是话语，组织就是组织。跨维度的互生回路落在它们的分析单元之间，而不是它们任何一家的分析单元之内。要捕捉它，需要的不是更精细的单一维度分析，而是一个能够横向整合制度维度、认知维度与操作维度之间互生关系的框架。

这就是“战争铸造”试图在理论坐标上占据的那个位置。

五、实践意涵：在机制链上寻找拆卸点

如果以上的分析在识别铸造机制上是成立的，那么其直接的实践意涵是：避免战争的真正有效工作，不应仅仅聚焦于悬崖边的那一刻极限博弈——在模具已经合拢之后，留给人的操作余地已经接近于无。真正的干预，必须在机制链的早期，针对每一个动态被启动和被强化的节点，进行精准的拆卸。

这并不意味着本文能够提供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操作手册”。它只能基于对“铸造”机制的诊断，给出干预的原则方向，并明确每一个方向所依赖的前提条件。

在制度维度上，对抗危机消化渠道被架空的关键，不是死守某一套具体规则不变的“纯洁性”——当这套规则已经被力量格局的变化所侵蚀时，这种死守只会加速它的空心化——而是守护“消化”这一功能本身可以被多种制度形式所承担的可能性。这要求在旧制度开始出现空转信号时，主动进行制度的重新谈判与修正，将挑战者从体系外的破坏者转化为体系内的利益相关者。这不是绥靖，而是对规则的可消化性的动态维护。然而，这种制度修正本身是有条件的：它只有在各方仍然将“维持制度”视为一个比“制度崩塌”更优先的目标时才可能运作。当至少一方的战略计算已经将“制度崩塌”视为可以接受甚至有利的结果时，制度修补的空间就被大幅收窄了。1914年的欧洲已经逼近了这个临界点。识别一个系统离这个临界点还有多远，本身就是制度性预防的核心诊断任务。

在认知维度上，对抗敌意认知自我封闭循环的关键，不是用“更多的沟通”去淹没敌意——在认知框架已然高度封闭时，沟通只会被双方的解码器自动吸入，重新加工为敌意的佐料。打破闭环，需要的是负责任的、高代价的“例外”信号——一种在对方封闭的叙事框架中完全无法预测的单方面克制。但这种信号的有效性，同样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它必须在认知闭环的早期阶段——在“例外”

仍能被少数内部声音识别并转化为内部辩论资源的时候——才最有可能不被自动消化。当闭环已经硬化到将任何例外都自动读解为“阴谋”或“软弱可欺”的诱饵时，例外信号的穿透力就无限降低了。这就意味着，制造“例外”信号的窗口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会逐渐关闭的可能空间；识别窗口何时关闭，本身是认知干预的关键判断。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拒绝军方全面空袭方案、选择封锁作为首步回应，并在公开声明中刻意避免将赫鲁晓夫逼入绝路——这个“例外”信号之所以能够被接收并扭转危机走向，部分原因在于，彼时双方敌意叙事的闭环尚未完全硬化到1914年的程度。识别这种“窗口存续度”的差别，正是冲突预防中最关键、也最难以程式化的判断。

在操作维度上，对抗确定性反噬的关键，不是放弃军事准备的严谨化（这既不现实也不负责），而是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为政治判断执意保留不被操作逻辑吞没的回旋余地。这要求在制度设计上——在预算编制、计划审批、危机模拟的环节中——强制性地植入“备选方案”和“弹性空间”。实践中，这意味着：总参谋部在编制战争计划时，必须被要求同时编制不同冲突烈度的备选方案（即使这会增加预算）；政治家在危机时刻必须有权要求军方提供“非战争”选项的技术可行性评估（而非仅仅被告知它“不可行”）；而军方对“不可行”的技术判断，必须接受独立的、外部的技术审查，以防止其成为掩盖认知偏见和制度惯性的黑箱。

六、反驳与边界：理论必须接受的最严格检验

一套严肃的理论，必须能够清晰地陈述“它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是错的”。本节正面处理两组对本文构成最有力挑战的反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理论的适用边界与证伪条件。

6.1 反驳一：结构决定论——铸造机制中的政治责任何在？

最根本的哲学反驳是：如果铸造机制如此强大——制度空转架空了裁决选项，叙事自噬封死了认知退路，确定性反噬压缩了操作空间——那么政治家的选择与责任如何安放？这是否会滑向一种新的结构决定论，将战争的责任从决策者转移给无面孔的“结构”，从而消解了本应由具体行动者承担的道德与政治责任？

这是一个必须被正面接受、而非回避的质疑。本文的回应分为两步。

第一步，澄清本文的本体论立场。本文并未主张铸造机制“消除了”人的选择自由。它主张的是：铸造机制系统地重塑了选择空间，使得“走向战争”的路径成为在特定制度与认知条件下阻力最小、不确定性最低、因而被理性计算所偏好的选项。在一个所有替代消化程序都已被证明无效的制度环境中，政治家选择战争，不是一个非理性的、疯狂的跳跃，而是一个在给定制度约束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后的“明智选择”——这就是这个机制最令人不安之处。

第二步，责任的归属位移。如果以上的分析成立，那么对责任的追问必须从前台延伸到后台。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罪”——这种扩散的归咎在分析上没有区分力，在道德上没有批判锋芒。

也不是说要把责任从“最后开关”上拔下来，换一个地方钉死——那种操作仍然被困在“找到一个最终责任人”的发现学框架内。发生学的追问方式不同：它问的是，铸造链条上的哪些具体决策节点——哪些在制度尚有弹性时做出的选择、哪些在认知尚有裂缝时发起的封锁、哪些在操作程序中执意消除容错空间的决定——构成了后续选择空间收窄的关键转折？如果决策者是在一个由前人及他们自己的先前选择所逐步铸造的模具中，做出了他们在那一刻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计算，那么责任的分配就必须被理解作为一种分布式过程——它分布在铸造链条上的各个关键节点中，不能全部集中到最后一个节点上，也不能因为被“分布”而消解。战争决策是这些先前选择累积所塑造的结局，而非某个孤立意志的突变。这不是在开脱，而是在精确化。

6.2 反驳二：冷战——为何铸造机制未导向热战？

第二个同样有力的实证反驳是：在美苏冷战对峙中，制度消化渠道枯竭（联合国安理会因否决权僵局而裁决功能瘫痪）、敌意认知的自我封闭循环（双方意识形态将世界牢固划分为不可调和的两大阵营）、确定性准备的反噬（核军备竞赛将“确定性”追求到足以毁灭地球数次的极端）——这三个条件显然均已激活，为何全面热战始终没有爆发？

本文对这一反驳的回应，采取一条与前一版本不同的、更为审慎的路径。前一版本曾试图将核威慑视为“铸造机制的自我逆转”，但这一处理存在一个被正当指出的问题：它将一个特定的外部技术-战略条件（核武器的毁灭性）内部化为机制自身的产物，有以修辞掩盖边界模糊之嫌。

本次修改版明确承认：核威慑所产生的那种压倒性的“战争不可获胜”的技术确定性，不是铸造机制自我运动的产物，而是一个应当被理论纳入为一个外部边界条件的变量。这个条件的核心效应是——在操作维度上，军事机器追求确定性的日常运转，自己计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全面战争将导致相互毁灭，而无可操作的胜利路径。这不是说军事机器停止追求确定性了——核军备竞赛恰恰是确定性追求在核时代的延续——而是说，这种追求的结果不再是“必须早打才能占优”的压力，而是“这仗没法打”的技术判断。当操作维度的压力方向发生了这种根本性的翻转时，铸造机制的三个维度之间的互生关系也随之改变。即便制度维度的消化渠道依然堵塞，即便认知维度的敌意叙事依然高度封闭，但操作维度不再为“总动员”提供唯一可行的技术路径，而是为“克制”提供了技术上可论证的理由。操作维度的压力面方向，是决定三个维度互生回路最终指向“更加战争”还是“更不战争”的关键转换器。

将核威慑明确定位为外部边界条件，不是理论的退却，而是理论的精确化。它界定了“战争铸造”的核心适用域：常规武器时代，或更严格地说，那种战争在技术和操作层面仍然严格地“可计划、可执行、且被理性计算视为可获胜”的冲突类型。当战争的不可获胜性在技术层面被确定性机器自身压倒性地证明时——如核报复不可避免地摧毁本土、或经济崩溃的确定性压倒了一切战争收益——本文理论的标准适用域就被跨越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铸造机制依然可能在制度与认知维度部分运转，但其操作维度的核心压力面已发生质变，模具不再能合拢。

6.3 边界条件与证伪方式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理论的边界条件如下。

第一，战争类型。本文理论最适用于解释“滑入型”战争——即参与者并非从一开始就意图发动总体战争、但最终被自身先前选择和制度惯性逐步推入战争的案例。对于主动的、精心策划的侵略型战争，本文理论的解释力相对有限，因为在侵略型案例中，决策者的主动意图在因果链中所占的权重可能远大于和平结构内部非意图性压力的累积。

第二，行为体类型。本文理论在对等的大国情境中最具适用性。在实力极度不对称的冲突中，消化渠道的分布极不平等，敌意认知的自我封闭在双方是不对等的，而确定性机器的逻辑也更复杂——这些都需要不同的分析框架来处理。

第三，技术条件。如上所述，本文理论的核心适用域是“战争在技术上仍然可计划、可执行、可获胜”的时代。当这一条件被核武器或其他产生压倒性“不可获胜”确定性所替换时，理论的边界就被跨越了。

第四，最关键的是，本文理论的可证伪条件。本文的核心判断将在以下条件满足时被实质性质疑：如果在一个高度符合本文所识别出的三种初始条件的大国对峙格局中——制度消化渠道在日常运转中已被反复架空，敌意认知已趋于自我封闭循环，操作确定性准备已显著压缩政治判断回旋空间，且战争在技术上仍然可计划、可执行、可获胜——双方竟然在没有压倒性外部强制力介入、且非侥幸地、可复现地，仅凭内部的制度弹性与认知松动，就成功地拆解了高度紧绷的敌意模具，并以代价可控的方式完成了关系的全面降级。如果这种案例从孤立的特例演变为可被规律性观察到的模式，我们就必须承认，本文所描述的铸造机制对人的选择空间的约束力被夸大了，和平结构的内部确实存在着一种本文未能充分概念化的自我修正能力。在当前的已知案例库中，这样的规律性成功尚未被清晰识别。但本文的框架，正是为了帮助我们以更敏锐的方式去寻找它——或者，在它缺席时，理解缺席的原因。

七、结论：在和平的缝隙里，拆卸下一场战争的模具

本文试图追问一个不同于主流病因学范式的战争起源问题：不必在人性、资源稀缺或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寻找一个可以被最终钉死的根源，而是在一段特定的和平结构的日常运转中，去追溯它是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运行到战争边缘的。

通过对一战前数十年欧洲和平结构运转过程的深度重构，三种相互咬合的生成性动态从历史互动的褶皱中逐步浮现，而非作为预制标签被钉在材料上。第一，危机消化渠道在日常运转中被反复架空——制度并未被正式废除，但其在一次次被援引与被违反中丧失了实质约束力，使得冲突丧失了被分散处理的制度出口。第二，敌意认知在一次次反向解读中封闭自身——从可被事件校正的判

断工具，蜕变为自行摄取事件并为之赋予固定敌意意义的封闭回路。第三，对确定性的军事准备以其自身的操作逻辑吞噬了政治判断的回旋余地——从一套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工具，逆转为在危机倒计时中主导政治决策时间窗口的刚性模具。这三种动态不是先后发生的三个独立“因素”，而是同一套历史进程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制度空转为认知硬化提供结构性推力，认知硬化为操作刚性提供威胁恒常的认知燃料，操作刚性则反过来以“技术不可行”的铁证加固制度失效并加剧敌意认知。三者互生的咬合结构，合力将冲突的形态从“可被分散处理的摩擦”铸造成了“必须通过全面战争才能结算的总体对抗”。

这一理论框架的不可还原性在于：它不仅仅描述了制度、认知与组织这三个维度的各自病变，而且捕捉了三者之间的互生传送。这一互生回路恰恰落在以单一维度为分析单元的制度漂移理论、安全化理论与组织社会学的集体盲区之中。通过一个以1914年俄国总动员决策为节点的判别论证，本文展示了既有理论的联合预测在“低威胁感知 × 极少操作路径”的判别格上与历史事实相悖，从而论证了本文理论收益的不可还原性。

这不是在主张某种关于战争必然性的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认清“铸造”机制的存在，正是为了更清醒地识别：在哪一个环节上，拆卸模具的工作仍然保留着操作的空间。当制度开始被架空时，主动的制度修正仍然是一个可操作的政治选项——尽管艰难。当敌意叙事开始自我封闭时，负责的、高代价的例外信号仍然可能凿开闭环——尽管窗口在逐渐关闭。当确定性准备开始反噬时，强制性地操作程序中植入备选方案和弹性空间，仍然可以为政治判断保留不被吞没的最后余地——尽管这需要制度性的预见和克制，而非危机时刻的急智。

当然，这些拆卸没有一项是容易的。它们恰恰是那些在和平光景中被长期视为“缺乏紧迫感”而一再被推迟的、繁冗枯燥的制度性工作。而一战前欧洲诸国的不幸，正在于它们在每一项上，都拖到了模具合拢的那一刻。人类是否已经获得了足够敏锐的制度自觉，能够在下一次模具开始运转的早期听到它吱嘎作响的声音——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所做的，不过是尝试给这个声音一个可以被更仔细倾听的频率。

本文的理论判断存在以下可被未来研究所检验的证伪条件：如果在一个高度符合“消化渠道已被日常架空、敌意认知已趋于自我封闭循环、确定性准备已显著压缩政治判断空间”三重初始条件的大国对峙格局中——且战争在技术上仍然可计划、可执行、可获胜——双方竟然能以非侥幸、可复现的方式，仅凭制度弹性与认知松动，就完成关系的全面降级与敌意模具的拆解，那么本文对“铸造”机制约束力的估计就需要被根本性地修正。

注释

[1] 本文所使用的“安全困境”概念限定在现实主义传统内，即赫兹与杰维斯所阐述的行为体因无政府状态下相互恐惧而导致冲突螺旋的逻辑，不包含后续社会建构主义对该概念的改造。

[2] 欧洲协调通常指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至1914年间欧洲大国通过会议外交解决争端的一系列非正式安排。其运作惯例远早于制度化国际组织，本文对此概念的使用限于这一历史语境。

[3] 材料说明：本文对1908–1914年七月危机中决策过程的重构，主要基于公开出版的外交档案汇编（如英国、德国、奥匈的外交文件系列）以及有代表性的历史研究著作；作者并未进行一手档案发掘。为服务于理论概念的生成，案例叙述对事件顺序与人物行动进行了选择性聚焦和逻辑简化，属于思想拓展性质的例示，不声称对历史事实做出排他性裁决。

[4] “危机消化渠道”这一概念指的是冲突各方可资利用的、能避免直接军事对抗的制度化争端解决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大国会议、仲裁、调停和非正式危机管理惯例。其“被架空”并非指制度在形式上被废除，而是指其实质约束力在日常摩擦中被反复掏空，直至各方不再视其为可行的选项。

[5] 本文的分析逻辑与组织社会学中的“正常事故”理论有可对话之处，但二者的焦点不同。正常事故理论关注的是复杂系统因交互紧耦合而不可预见地触发灾难；本文关注的则是系统为追求对最坏情况的确定性控制，主动消除备选方案与操作弹性，从而在危机时刻丧失了吸收冲击的能力。前者是失控的灾难，后者是主动消除容错空间所导致的脆弱性。

[6] 本文的核心分析对象——冲突的形态转化——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存在根本差别。后者分析的是言语行为如何将某一议题建构为“存在性威胁”并使之进入安全领域；本文分析的是已高度安全化的制度常规本身如何作为“模具”反塑冲突的形态。二者的分析单元、理论目标和因果方向均不同。关于本文与安全化理论的具体区分，详见第四节的理论对话。

参考文献

- Allison, Graham T.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Buzan, Barry,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1998.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 Deutsch, Karl W., et al.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Charles L. 1994.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 50–90.
- Herz, John H. 1950.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2): 157–180.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 Jervis, Robert. 1982.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357–378.
- Jervis, Robert. 1997.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honey, James,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2010.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rton, Robert K.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ed. Glencoe: Free Press.
- Perrow, Charles. 1984.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251–267.

Snyder, Jack. 1984.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reeck, Wolfgang,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2005.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Evera, Stephen. 1984.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1): 58–107.